
中国西部牧业发展和野生生物保护： 青藏高原保护地区合作管理模式

Marc Foggin^{1,2,3,*} 富礼正博士
Email: foggin@plateauperspectives.org

¹ 起步高原，加拿大魁北克 J4P 2T1 兰波特大街胡桃大道 200 号

² 7NZ, UK 英国坎特伯雷市 CT2 7NZ 肯特大学人类学和保护学院

³ 中国青海省西宁市青海师范大学 810008

联系方式：中国青海省西宁市青海师范大学 810008

摘要

牧民们长期居住在中国西部广大的区域，包括青藏高原地区。他们传统的土地使用习惯和文化保护理念有助于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与人类共存在草原和山地的野生动植物。

然而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国家社会经济环境中，包括自然保护区面积的重大扩张和区域性发展计划，高原地区的牧民社区并不能总在密切影响他们生活的资源保护和发展对话中有发言权。但是牧民们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中能够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遗憾的是这种可能的贡献到现在为止都很少能得到承认。

随着合作管理模式的引进和发展，一种当地社区，自然保护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土地层面进行保护的模式正在青海省兴起。有效的共同管理是这些核心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

还有一个当地牧民所提供的直接和间接服务的价值问题以及各项回报重要服务补偿和支付方式。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来展示在过去十年当中在长江源头所试点的共同管理项目具体的经验和教训来提供一些对这些问题新的研究，包括当地社区开展的生态旅游，当地牧民合作社和信托基金的发展，以及进一步澄清当地规章制度（责权利）。从而更完整，更详细地展示出合作管理的模式。

关键词：合作管理，藏族牧民，自然保护区，中国西部地区，景观保护

背景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领土面积几乎和欧洲一样，其人口已超过 13 亿。中国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整个世界，无论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气候变化当中，保护的方法或在复杂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中平衡需求和利益等。此外，中国既是众多野生动植物，尤其是受到威胁或处于灭绝动植物和众多民族，文化和生计的家园。中国西部

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如哈萨克，藏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等的家园，他们通过自己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在广袤的草原环境的形成和保护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地居民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高度重视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性的使用。

青藏高原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并且它是世界上最高山脉集中的地区，由亚洲主要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组成，因此青藏高原以亚洲水塔和世界第三级而著称（富礼正博士 2005 专著，丘 2008，王和付 2004，姚等 2011 年文章）。当地传统生计是流动放牧，在著名的草山之间进行季节性的游牧，加上部落和宗族对区域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决策的社会结构（富礼正博士 2005 年专著，格登斯坦和北奥 1990 专著，米乐 2000，西伊等人 2006 论文）。管理的灵活性和其它规避风险的措施，例如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也同样在自然资源利用的放牧体系中得到了发展（奈斯 2004，许等人 2006 年）。高海拔的区域，有着广袤无际的草原，无数的湿地和高山，不仅仅是藏族牧民和牲畜的家园，而且是大量稀有和濒于灭迹的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包括藏羚羊，百春鹿，野驴，岩羊，雪豹，兔狲，藏狐，宗熊等等。此外高原濒危的鸟类包括黑颈鹤，斑头雁，金雕，髯兀鹰，猎隼，蓝马鸡，藏朱雀等等。

为了满足亟待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之间平衡关系的需要，过去几十年，中国已设立一批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中国亦已全面实施内陆地区发展计划，即“西部开发战略”（中文：西部大开发）。此项深远的发展战略计划包括“主要环境问题初探：草原的恢复与保护”，涉及中国陆地面积多达 40%，例如：通过临时停用草场缓解畜牧压力（中文：退牧还草）、生态安置项目（中文：生态移民）（富礼正博士 2008，刘等 2005，王 2009，辛 2008 论文）。2000 年起，在中国西部地区所创建的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同样隶属于上述提及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组织。根据国际协议，例如：1993 年中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自然保护区保护意向声明（例如：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规定，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正式生态保护区项目获批的同时，应予以考虑当地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然而，有关是否应该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特殊活动、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项目决策程序等问题，当地居民与自然保护机构对于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尚未明确。在非保护区域，类似问题亦已突出，如：环境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需要是否平衡、怎样使得当地牧民避免受害而成为保护项目受益人。因此，应迫切寻求景观保护与畜牧发展的新方法。

政府环保部门采纳并执行的地区与野生动植物管理办法，如：正式保护区域的内部与外围不仅影响生物多样性，更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身体状况。制定诸如此类的重大决策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发展社会政治、推动生态和谐（布雷维克 2007，哈里斯 2009，叶 2005 论文）。中国西部地区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伴有复杂性，关于长期使用土地资源这一问题，需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互动与沟通。倘若将恰当的方式贯彻融入保护地区管理计划、区域发展计划实施之中，许多传统土地利用方法（包括当地居民的支持与有效合作）将得以治理，从而达到一致的环保目标。

项目背景

起步高原非政府组织，自 1998 年起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始运作，已志愿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地理与环境方面）一项关于环境保护与生态部落发展整合项目。针对长江

上游源头的考察，结合当地发现并上报的需求，此项举措已连带强调有关环境及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参见富礼正博士 2000，2005 实践总结，富礼正博士等 2006，富礼正博士和托兰斯-富礼正 2011 论文）。期间，该组织持续关注群体需求（即：若干特殊合作团体），而非预定性主题，如：教育、医疗、环保方面，此类先例问题通常被外界，如非政府性组织，定义为“地区特色”，因而发展成为“共同管理”（亦作：合作管理）实践经验。另外，此项举措涉及环境资源保护、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大部分问题。此篇论文论述点为：青藏高原当地共同管理经验及野生动植物与牧民的相互影响（图解 1，图解 2），对长江源头区域关注。

图解 1 藏族部落与家庭

图解 2 藏族游牧生活

起步高原组织主要资金用于引领与发展关于环境保护，尤其针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新型或更多合作性项目，其资金来源于挪威发展合作署、若干私人基金会及独立发起人。当地合作者包括：青海西南地区县、镇、乡级政府，社区管理组织、省林业厅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青海师范大学研究人员、青海省行政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中，有许多特有及接近特有的、或濒临灭绝的物种。居住在青海境内长江源头上游的当地牧民社区不论出于个人还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抑或是由于美学和传统信仰的影响，始终重视这些动物并给予高度评价。用一位社区领导的话来说：“在藏族传统观念中，金银滋养着土地，同样，我们视野生动植物为大地上的装饰品。没有野生动植物，大地会变得毫无生息，我们会感到内心空虚，会失去与大地的联系”（视野 2005）。对于当地牧民而言，一些物种拥有重要的宗教意义，例如黑颈鹤（图解 3）。

图解 3 黑颈鹤

基于上述原因，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若干社区通力合作，首先建立一个当地非政府性组织——长江上游保护与发展组织，其次详细描述在此地区若干社区保护区的情况（博瑞尼-费耶拉本德 1996 论文，博瑞尼-费耶拉本德等 2004 实践总结）。该组织希望并计划保护与发展同步进行，从而为作为组织成员的社区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作为整个社区代表，为积极参与保护工作，应组织成立环境保护成员团队，如：雪豹监察组、垃圾处理组等等。各组织可选择不同的物种(或栖息地)作为关注对象，社区保护区联盟可以通过广泛建设工作网，集中考虑相关问题。事实上，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西部索家镇牧民们已制定关于“人口集中，多种运用，地区保护，土地利用”的管理计划（图解 4）。起初，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保护当地野生动植物，并希望得到上级政府部门或环境友好型经济事业单位的认可与支持，如社区旅行社（李、韩 2001，倬 2011 论文）。社区保护联盟特别关注雪豹、藏羚羊、西藏野驴、黑颈鹤以及当地重要的湿地栖息地。随后，藏野牦牛也引起社区保护联盟的关注，并制定相关保护计划。

图解 4 三江源生物保护区索家区社区保护带处于青藏高原核心地带，是保护区域多种运用计划发展基地

起初，社区保护联盟成员多数由各社区选择，长江上游保护与发展组织和起步高原提供相应帮助与支持，直到 2003 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引起了国内外对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更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几年后，当地社区不断努力保护那些正式列入于 2007 年 11 月制定的“共同管理三江源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中文：一村一点项目）之中的热门物种（拉嫫、次仁 2008 论文）。通过社区保护联盟最初的成员，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资源管理这作模式在三江源索家站点得以实施，此站点是世界最大自然保护区首批合作实验站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面积 152, 300 km²）（图解 5）。三江源保护区的正式建立有双重目标：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重点保护高山湿地和草地、地区特有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推动地区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富礼正博士 2005 学术论文）。关于自然保护区更多详尽信息可查阅拉嫫、次仁（2008 论文）、富礼正博士（2005 学术论文）。

图解 5 中国青海省南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地图

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正受到当地居民和社区间的共同合作保护，其中，稀有动物雪豹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比重增加（数量估计：4080 至 6590 只之间，杰克逊等 2008 论文）。根据摄像追踪调查（作为牧民直接观察），索家成为雪豹密度聚集的高度关注区，确定数目为 7 至 9 只，活动范围在近 150 平方公里之内（起步高原 2011 学术论文）。同样，作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藏羚羊也面临生存威胁。据统计，现有数量约有 150, 000 只之多，而曾经多达上百万只的数量（马伦 2008，沙勒 1998），野牦牛数量约为 15, 000 头（哈里斯、莱斯利 2008）。藏羚羊和也牦牛在索家地区都占有一定的数量。自 1998 年，保护社区联盟规划项目区域，黑颈鹤在此地区内也相对密集，约有 11, 000 只（国际鸟盟 2012）。此外，西藏野驴的数量日益增长，约 60, 000 至 70, 000 头之间（沙等 2008），然而，从生物学方面来说，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季节性迁徙以及物种分布缺乏认识（沙勒 1998，沙 2002）。雪豹（图解 6）和野驴（图解 7）有时会袭击当地牧民饲养的牲畜，对当地牧民造成伤害。因此，对于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物种的长期追踪监视与研究，必须发展适当的管理方式。对当地居民饲养的牲畜造成伤害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棕熊和狼。

图解 6 雪豹（跟踪拍摄）

图解 7 西藏野驴

过去，非法猎杀是野生动植物所面临最主要的威胁。然而，随着野生动植物法的不断完善，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在当地以至于全中国范围内，野生动植物更是面临栖息地环境的变化及退化（例如：公路建设、整改放牧饲养区）以及人类的侵害（旅游不规范、开发新城镇）。结合上述因素，牧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计划的推进需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宣传合作管理这项新型保护措施（学习社区保护联盟初期的细致计划）。第二，初建基础社区生态旅游项目，此项目若能通过国际生态旅游规定的认证（国际生态旅游组织 2012），在推进环境保护日程的同时，亦可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参与此项目的三个合作组织皆受到国家环保部门的认可，分别是三江源自认保护区索家站、起步高原、以及曾参与一村一点项目的藏区牧民社区。

牧民共同参与的主要活动项目

近年来，当地社区成员一直保持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政府当局的合作关系，其实际工作人员为自然保护区看守人。他们的基本职责包括监测野生动植物数量、巡逻队巡查、加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例如：穆曲村已参加雪豹监测与保护合作管理项目。早期，大概从 1998 年起，简单的数据统计适应于文盲或半文盲的参与者记录当时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物种数目。自 2007 年 10 月起，通过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看守人员对当地社区管理模式的讨论，全体项目参与者一致决定实行详尽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收集数据、制作时间表与工作总结。雪豹保护队的所有成员同样规划野生动植物管理分界线（图解 10）、野生动植物管理分界时间（一年四次的具体日期）、信息收集内容（对于雪豹的监测，分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包括抓等肢体动作、动物的叫声以及狩猎目标）。通过长期系统收集数据（反复监测），雪豹数量区域分布逐渐呈现趋势性分析，从而有助于社区及自然保护区政府部门下发或直接执行管理命令。此数据收集方法（及其他共同管理方法）在今后经过不断改善，通过对成员进行远期培训、完善工作机制，对同一地区进行更多的野生动植物数据分析，一方面将有助于缩小数据采集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助于管理决策的制定（环境保护实施方案）。

图解 8 约 1998 年，当地居民运用简单的野生动植物数据收集表

图解 9 2007 年 10 月，索家地区社区参与共同管理项目初期会议

图解 10 当地看守人员反复监测雪豹监测路线

自 2008 年至 2010 年，通过不断努力监测，当地监测人员记录了 22 只雪豹监测数据信息。此外，监测动物还包括：西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岩羊、原羊、藏瞪羚、白唇鹿、兔狲、棕熊、野兔、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棕头鸥、渔鸥。

除了切面式监测，2010 年 10 月，摄像追踪计划正式启动，从而使得社区看守人员采集的雪豹监测数据更具真实性、完整性。通过照片分析（图解 11），从 21 个拍摄地点近 100 张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 7 至 9 只雪豹出现活动在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这类新增收集信息与切面式监测收集信息的方法可互作补充，并一直延续。此外，更多的培训有助于当地管理人员确保野生动植物信息收集的系统性。建议看守人员与监测站管理人员完善设施，以帮助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与藏族牧区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共同管理合作关系，提高开发项目质量。

图解 11 雪豹数据标记与个体鉴别视觉分析图

根据目前以及未来预期发展变化，雪豹监测数据收集价值体现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如：道路建设项目、日益突出的旅游发展不规范，等等。以现有有效信息为基准，开始发挥潜在影响力，可以预测并指导未来自然资源与野生动植物管理模式，以及项目的开发。

支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

当地社区为了当地及区域利益寻求保护环境的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如何制造就业机会。伙伴关系意味着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同样的，合作管理模式也应同样满足当地需求与愿望（里德 2008；斯奇里克 2011；杨 2011）。此外，从实际的角度出发，以支付或补偿当地群众和社区的方式获取其服务-无论是直接性服务，如参与野生动植物监控，加入反猎捕小队等，或间接性服务，如维持生态功能的土地利用活动-同时还需要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达的，公平，透明，实际的社区层次的金融体系。

社区生态旅游现正在青藏高原偏僻的农村地区兴起，很大程度上得到当地政府政策的扶持。然而，保护区计划仍需进行以下尝试-帮助引导和促进此类活动的同时适时的进行约束和限制。容许在保护区开展的社区旅游类别及范围需进一步透明化（李与韩 2011；王等人 2009,2012）。如果许多与旅游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在生态旅游定义（与自然旅游有着显著区别；起步高原 2012）上取得一致意见也是有益的，这样，如扶贫机构这样的政府其他部门会认识到当地群众及社区可能在旅游部门起到的作用（参见：旅游促发展，或社区开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与自然旅游密切相关，但其核心却与自然旅游大不相同。生态旅游不仅仅是指游览自然风光秀丽的地区，尽管此类旅游被认为是负有责任的，可持续性的-这仍属自然旅游。最为明显的是，透过其定义，生态旅游必须直接为当地社区的福祉做贡献，包括切实的保护行动（不仅仅是‘无害’）-如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所释，也提供了生态旅游关键原理和其它有用指南（国际生态旅游协会 2012）。

综合以上考虑，建于 2009 年的科嘎哇合作社为一项个案研究。该合作社现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拉日村的约 30 个家庭组成。由 7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监视其正常运营，重大决策则在每年的大会上通过投票产生。合作社成员投资金额不等，从而构成合作社核心基金，但每一个成员都拥有平等的一张选票。现在他们还开始尝试一些商业活动，如在县城经营小商铺，开展社区旅游，畜产品增值及手工艺品开发。

社区信托基金是能够利用其资助社区利益活动的另一条创新路，还能为个体社区成员提供贷款。这种信托基金方式同样可用于接受及管理合作管理项目背景下社区支付的款项，如野生物保护计划费用，社区生态旅游商业投入收益，等。此类信托基金特别适用于人口稀疏的偏远地区，如有着旨在管理共同财产资源社区范围行动传统的藏族牧民。我们已经开展了赴中国内蒙古，四川及云南省的考察活动，以便在建立三江源

无论地方治理是否能够通过牧民合作社，信托基金或其它途径加强，扶贫工作都能取得进展，只要当地群众能够（经济上或其它方式：纳巴维 2009）通过自己创造开发中小型方案。基于此目的，最近，，我们进行了几次针对社区旅游业（融合保护与经济需求）发展的社区讨论，试行了几次生态旅游，并在青海师范大学与起步高原共同主办的战略讨论与计划研讨会背景下，提议建立‘态旅游网’。现在社区生态旅游正同当地自然保护区计划相结合，最初为保护区试验站级别。这种在合作管理庇护下的相互支持，社区层面上的保护尝试加之支持适当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如社区生态旅游），可为发展长期合作关系及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打下基础。

合作管理：填充列表空白

自然资源的合作管理，或切实的为了任何协议目的合作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但如果执行正确，却是一条能够将利益最大化的途径（陈等 2012；刘等 2011）。正如韦尔努伊（2011）总结的，合作管理是‘构建社区顺应力，适应性管理的一种形式’。合作管理的优点在于相互增强关系，使各部分互相承担任务。因此，合作管理更像是双行道高速公路，付款后提供相应服务。它包含更广泛的关系网，支持行动，相互理解-这些同时能够实现一致的共同目标。

如果从极简化角度理解，合作管理可能没有包含所有对可持续性或野生动物保护十分重要的关系，互动和交流。就社区参与而言，例如，有一种危险是合作关系给当地群众的唯一权利是允许其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换来的是要他们做社区守护人提供服务。这样做确实是有价值的（即与重新安置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相比，由于政府政策促进‘生态移民’而言；富礼正 2011b；富礼正及托伦斯-福根 2011），但利益相关者仍有更高水平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问题在于当地群众的劳动如何得到偿还-无论是关键生态服务保持（参见 可持续性土地利用），提供服务准备（如，作为野生动物监视者做出的贡献）或是由于保护限制条件而失去经济机会（如按要求减少牲畜数量）。

合作管理方法也应考虑为转移机制提供资金的需要，包括社区层次的适当融资和管理结构发展，接受监管款项。根据政府规定增加透明度-如关于社区合作社及社区信托基金的建立与运行，在保护区发展社区生态旅游的范围-还有助于牧民社区和保护区之间良好关系的发展。关于合作管理这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显然包含属于当地牧民和保护机构多种角色，关系和责任，这些都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在图 12 及表 1 的列表中。简言之，在一个更加充分发展的合作管理模式下，牧民不但会通过野生动物数量实地监视，支持反捕队等方式为保护机构做贡献，反之，当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尝试也会得到扶持，只要这些因素在该地区环境保护目标参数之内依然明显。（无论是保护以内还是以外）。因此，诸如西藏草地环境的社会生态系统覆加‘合作管理模式’（图 12），这种模式应包含三个层次，每一层占互补的一小半（见表 1）。一，社区成员直接提供的服务应得到适当薪资；二，间接服务如适当的生态系统功能维护（无论基于传统习俗延续，或是采用新的可持续性土地管理办法），此类生态系统服务都应得到足够的薪资偿付，或者是经济机会错失（参见：生态补偿）；三，政府应提供支持，使得对环境无害的社会经济发展能在生态利益区实行。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就战略机会和影响当地发展的立法增强透明度，如自然保护区社区生态旅游，为社区财务机制和结构创造更多空间，例如社区合作社和信托基金。

图 12 关于草地社会生态系统合作管理概念图

表 1 拓展合作管理模式中合作者提供服务及所得利益

	社区采取的对保护机构有益的行动；	保护机构采取的对社区有益的行动
直接贡献	野生物监视，反捕小队，增强环境意识活动，等。	偿付所提供服务
	可持续性土地利用，参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偿付生态系统服务或其它形式的生态补偿
支持举措	当地治理-当地决策与筹资方式或机制的发展（如 牧民合作社，信托资金，等），可能协助新的经济事业的发展（如 社区生态旅游）	调节-明确的法律框架开发（如用于保护区社区生态旅游，公私合作），能够帮助新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产生，传统法律框架及国家章程

然而，表一中所有的‘空格’（即话题或问题）并没有全部通过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合作管理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决。但还需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关于生态补偿机制或生态系统服务的薪资发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通过合作管理的镜片透视清楚。幸运的是，这类疏忽都将很快通过针对合作管理的大型项目进行调整，该项目由青海省政府和联合国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共同提供资金，名为 *增强保护区效益保护青海省生物多样性*。通过此类大型项目我们希望可以激励并提供必要的技术输入更加全面的填充列表空白-从而发展继而在中国西部草原地区广泛呈现和拓展更为均衡，可持续性更强的合作管理模式。

未来之路

未来之路就在前方-即是光明坦途，也是具有人文因素的冒险之路！

根据青藏高原地区多达十年的直接经验，观察并协助社区野生物保护举措，对于吸纳当地群众支持参与保护（相反的，支持社区保护举措）最具前景的方式似乎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合作管理’。这类方式可能样式，名目繁多，但共同的标准是真诚的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之上，为了寻求创造能够使西藏游牧生活方式保留的同时加强野生物保护成果的有效环境，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于 2005 年提拟合作管理框架（富礼正 2005a），该方法自此在索加地区实行和发展至今。

合作管理定义为‘一种合作关系，在此关系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同意分享他们对于一片受保护领土或其资源总体的管理职能，权利及责任’（博里尼-费耶拉本德 1996）。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真诚合作对于成功的资源管理至关重要，但存在利益分歧的群体必须共同工作。这种合作关包含理解由人类与自然部件组成的复杂系统（布卢门撒尔与亚宁克 2000）。然而，当一队不同的当事人同意一起工作，他们也带来了不同的能力-即知识，技能，资源等。-这也能积聚彼此的优点（罗斯与鲍威尔 2008）。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最终目标是野生物保护，那在什么具体的事项上才需合作呢？不仅仅是要求当地群众担当野生物监视者（或看守人），无论是无偿的方式换取继续居住在该土地的权利，还是正式支付费用-对于保护目标，‘合作管理’也应考

虑其他形式的交换与出资，如利用偿付生态系统维护费用，或生态补偿机制来换取牧区社区可持续性的土地利用和野生物保护（见表1）。内蒙古地区多达10年的经验或许可以给合作管理发展提供更多见解，当地到区域层面产生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利益（施密特2006；叶克汉拜等人2004）。韦尔努伊（2011）已经恰当的将当地群众定义为合作管理尝试中的关键社会单位，但还是有必要通过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确立明确的角色及其责任的方式，让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发展计划和决策中来。因此，对于发展而言，合作管理既不是自上而下组织管理严密的方法，也不是自由放任的政策（叶克汉拜2011，引自韦尔努伊2011）。

采取合作管理方法进行野生物与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大步。像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往往忽略环境保护的人文因素，尽管人文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具体保护目标的社会因素，而这些目标又直接决定着项目的成败；仅靠生物性的考量和技术干预是很难获得期望成果的。然而，执行这一新方法时，有机会帮助行为模式的塑造和改变-利用合作关系对野生物进行保护从而更全面的参与社会。如果这种方法不能完全实现，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也就是环境保护及成本效益的合作，反捕队支援，通过观察定期提供野生物数据，提供能够帮助指导保护管理决策的辅助信息。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和尝试，提供政治支持及对自然资源的社区合作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在长江源头藏族牧民社区长达十年的经验，至少在原则上被国家当局承认是对如今赞同的合作工作时有帮助的。应鼓励以人为本的野生物和自然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也只有通过公平，公开的商讨和达成共识的途径为保护工作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可行选择。多行动者标准必须融入单一系统思想，融合多部门，和多个利益集团。必须产生利益的融合。尤其是这些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牧民本身。正如在此陈述的，牧民现在正在重新证明他们仍然能够在生态服务维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起到动态作用，同时他们熟悉维持生活状态的土地和资源，他们也在寻找社会经济机遇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集合。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

作者信息

富礼正系起步高原主任，肯特大学人类学与保护学院荣誉研究院，及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杰西·蒙特斯，杜发春及卡罗尔·凯尔文，使他们修订了该手稿的早期版本。对于我们在此描述的工作中的长期合作，我还要感谢马里恩·托伦斯-福根，吉格梅·拉布登及贡布扎西。

参考文献

班克斯 T,C 理查德及智仁, 2003 年, 中国西部地区社区草原治理, 理论说明, 山地研究调查及开发, 政策含义, 试点项目经验 23(2): 132-140. doi:10.1659/0276-4741(2003)023[0132:CGMIWC]2.0.CO;2.

鸟类国际, 2012, 物种信息, 黑颈鹤。 <http://www.birdlife.org>. 2012 年 5 月 12 日查阅

B 布鲁姆 D 和 JL 珍妮, 2000 年。合作管理方法分类。保护生态 4(2): 13-XX. <http://www.consecol.org/vol4/iss2/art13/>. 参见 2012 年 7 月 6 日

博瑞尼费耶阿本德, G。1996 年。保护区合作管理: 调整接近上下文。IUCN 社会政策团体, 瑞士: 国际自然与自然保护区联合会。

博瑞尼费耶阿本德, 皮波特, 法雯, 科萨里和雷纳, 2004 年。权力分享: 在全球自然资源的合作管理中通过实践获得学习。国际环境与发展协会和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德黑兰。

博瑞尼费耶阿本德, 科萨里, 奥维耶多。巴西, 拉尔森, 费拉里, 潘思格, 2004 年, 朝公正和加强保护, 政策指导和合作管理保护区域的实践及社区保护区域。最佳实践保护区域参考系列号: 11,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世界保护联盟: 世界保护区域委员会。

布雷维克, 2007 年。中国青海省草原保护的政策生态。硕士论文: 论述政策与牧民。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系。

陈, 施瓦克特, 朱, 马多克斯。2012 年, 中国的生活可持续性 & 社区基础林业资源的合作管理: 变化与改善, 环境管理 49 (1) 219-228.

乔, 2011 年。通过生态旅游在中国云南三江并流地区 (世界遗产遗址) 扶贫。硕士论文: 东亚研究, 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

富礼正, 2000 年, 青藏高原草原的生态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性的研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态系博士论文 <http://www.platauperspectives.org/foggin2000>. 参见 2012 年 5 月 10 日

富礼正, 2005 年, 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保护和社区发展: 保护规划会议的进程, 同意优先行动要点, 由起步高原, 长江上游组织, 治多县政府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于 2005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3 日在中国玉树举办的保护规划会议。西宁: 起步高原。

富礼正, 2005 年, 高原遭遇。建立新的保护合作伙伴及长江上游 (青藏高原的中心) 的可持续发展。创新社区: 亚太地区以人为本接近环境管理。维拉斯奎斯, 八城政基和我, 131-157, 东京国立大学出版社

富礼正, 2008 年, 藏区草原的退化, 中国青海省藏民牧民的未来远景和民族政策, 山地调查研究和发展。28 (1) : 26-31. doi:10.1659/mrd.0972.

富礼正, 2011 年, 追踪西藏雪豹, 当地牧民对于保护长江源头地区的雪豹极为重要。英国伦敦, 中国对话。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4615-Slideshow-Tibet-s-snow-leopards>. 参见 2012 年 7 月 6 日

富礼正, 2011 年, 反思生态移民与文化延续的价值, 王, 宋和胡的回应。人类环境的期刊。40:100-101.

富礼正, 巴斯, 2010 年。主流环境持续到发展。藏区草原的合作土地管理。英国领先国际。 <http://www.lead.org/images/documents/collaborative-land-management-in-the-tibetan-grasslands.pdf>. Accessed 6 July 2012.

富礼正, 托马斯福金, 2011, 如何为移民的藏族牧民提供社会与环境服务? 中国青海省的合作案列。牧业调查研究, 政策与实践 1:21

富礼正, 托兰斯, 多杰, 喜饶, 福金及托兰斯。2006 年, 青藏高原阿尔匹斯草原上的康巴藏族牧民的健康状况与风险因素的评估。社会科学与医学 63: 2512-2532. doi:10.1016/j.socscimed.2006.06.018.

戈尔茨坦, 比尔, 1990 年。西藏西部的游牧民: 生活方式的遗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哈里斯, 2008 年,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 保护中国西部野生动物栖息地。阿蒙克, 纽约及伦敦。

哈里斯, 2009 年, 青藏高原的牧场退化, 证据及其重要性和原因的回顾。干旱环境期刊 74: 1-12

哈里斯, 莱斯利, 2008 年, 牦牛,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胁物种红色名录, 2011 年 2 月版, <http://www.iucnredlist.org>. 参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

与麦考利土地利用研究所的合作的见解, 2005 年。由欧委会六个组织共同合作的发展项目资助的作为诺玛项目的一部分拍摄的视频。

杰克逊, 马伦, 麦卡锡, 陈大伟, 哈比卜, 2008 年, 雪豹,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胁物种红色名录, 2011 年 2 月版 <http://www.iucnredlist.org>. 参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

科塔里, 2008 年, 保护区与人民, 未来与过去。帕克斯 17 (2) : 23-34

拉毛, 才仁, 2008 年,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加社区合作管理与生态多样性保护项目计划。中国西宁: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起步高原, 参见 2012 年 5 月 20 日

李, 韩, 2001 年,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

刘，岳，鞠，王，李，2005 年，中国西部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中国北京：科技部，参见 2012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maweb.org/en/SGA.WesternChina.aspx>

刘，哈里斯，赵，蒋，钱，2011 年。中国内蒙古科尔沁自然保护区草原管理和湿地为一体的社区发展。东部和西部以及中亚的候鸟迁徙湿地的保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西伯利亚鹤湿地项目建设研讨会的进程，2009 年 10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哈尔滨：巴拉伯，美国威斯康辛州国际鹤类基金会。

莱娜姆，德琼，希尔，库索曼托和埃文斯，2007 年，合作社区知识工具，参数以及决定自然资源管理的价值的回顾，生态与社会。参见 2012 年 5 月 20 日

马伦，2008 年，藏羚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胁物种红色名录，2011 年 2 月版，参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

米勒，2000 年，中国西部藏族游牧民的艰难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牧业，游牧民族

纳巴维，2009 年，贫困与微小企业发展，欧洲社会科学期刊

拉斯，2004 年，风险与不确定性并存，硕士论文，西藏阿里盆地的游牧民的情况。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社会人类学系。

起步高原，2011 年，雪豹调查研究与保护，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验心的合作管理模式，田野调查报告，中国西宁起步高原。

起步高原，2011 年，新型的生态多样性保护，藏区草原的社区合作管理。项目信息手册。2011 年 12 月，中国西宁起步高原。

邱，2008 年，中国第三极的自然。

里德，2008 年，环境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文献回顾，生态保护。

罗斯，鲍威尔，2008 年，合作管理，太平洋地区的水资源选择，澳大利亚水资源研究政策简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水务中心。参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

沙勒，1998 年，藏区草原的野生动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施利克，2011 年，青藏高原的生态多样性的保护治理。跨尺度联系及连接组织。硕士论文，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环境与地球科学系地理学院。

施密特，蒙古南部隔壁地区的牧业社区组织，生活和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中亚的牧场。关于转变，问题及未来挑战的会议的进程。2004 年 1 月 27 日，美国盐湖城。贝达纳，麦克阿瑟，费尔南德斯，吉梅内斯，美国农业部林业服务，落基山脉研究所，美国农业部林业服务进程，柯林斯堡。

沙，2002 年，西藏野驴的状况与行动计划，马科动物，斑马，驴和马，情况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摩尔曼，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马科研究专家组。

沙，圣路易，于邦，布莱斯，格鲁森，库雷西，2008 年。西藏野驴，世界自然保护连
忙受胁物种红色名录，2012 年 1 月版，参见 2012 年 7 月 6 日

希尔，米勒，约翰逊，青藏高原传统的牧业生活系统的转变，赛凯雷斯。

申，李，陆，2011 年，中国西部的新型保护，绿色中国，关于环境和发展的中国视
野，基利，郑，英国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组织。

国际生态旅游协会，2012 年，何为生态旅游？参见 2012 年 5 月 15 日

韦尔努伊，2011 年，蒙古牧民如何转变游牧业？解决方案 参见 2012 年 6 月 12 日

王，2009 年，中国西部的生态回复，问题与提议。

王，富，2004 年，青藏高原的阿尔卑斯草场的可持续管理，问题分析与改变建议。

王，山田，黄，2009 年。生态旅游政策与中国生态旅游发展含义的比较，中国旅游研
究期刊。

王，英尼斯，吴，克日扎诺夫斯基，殷，戴，张，刘，2012 年，中国国家公园发展，
保护还是商业化？

辛，绿色热情席卷青藏高原。科学版 321：633-635

徐，杨，李，扎西，夏尔玛，方，2008 年，了解土地食用，生活方式及藏族牧民中的
健康变化。中国西藏自治区当日县贡嘎镇的案列。生态健康。

杨，2011 年，加强可持续的保护区管理合作，硕士论文，中国西南九寨沟国家公园的
范例研究。新西兰梅西大学。

姚，汤普森，穆斯布鲁格，马，张，杨，加息维克，2011 年，第三极环境，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策简要系列

叶，2005 年，中国西部的绿色政治与牧业，覆盖牧场到草原，游牧民族。

伊堪伯，蒙古的自然资源合作管理，十年的经验，乌兰巴托管理出版社。

伊堪伯，恩赫巴特，阿尔普坎，韦尔努伊，格雷厄姆，2004 年，转变草原退化和改善
蒙古阿尔泰地区牧民的生活。山地研究与发展。